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历史学

中国古代史卷

上册

主编 彭江 张彤 张金龙

顾问 林甘泉 李学勤 陈高华 童超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历史学

主编
彭卫
张彤
张金龙

中国古代史卷

20shijizhong huaxueshujingdianwenku

上册

顾问
林甘泉 李学勤 陈高华 童超

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

中国古代史卷

上册

彭 卫 张 彤 张金龙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lzu.edu.cn

<http://www.lzu.edu.cn/press/index.htm>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8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09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311-01715-7/K·219 本册定价:39.00 元
全套定价:117.00 元

出版例言

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百年，也是学术研究新旧交替、硕果叠出的一百年。其间涌现出的不少学术大师、著名学者及其许多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为中华学术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树起座座丰碑。这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21 世纪中华学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起点。但是，20 世纪又是新潮激荡、世事纷繁的一百年，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泛滥、人心的浮躁，又使学术园地中嘉卉与莠草同在，美玉与瓦砾共存。久而久之，许多学术瑰宝将有湮没无闻之虞，后学新进则颇费搜寻爬梳之劳。因此，为披沙简金、嘉惠后学，让一代又一代学子能获前贤之薪传，更快地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在咀嚼英华的基础上去更好地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学术事业之发展，我们在广泛征求学界意见的基础上，特邀著名学者为顾问，委托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力求从浩瀚的学术文献中精选出本世纪各学科最具学术价值、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论文，编为《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作为世纪之交的一份厚礼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经典文库历史学部分的选编工作历时近两年，各位学术顾问和各卷主编本着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严格公正、务精求真、兼容并蓄的原则，广泛搜求、反复比勘，在确保入选论文的科学性、学术性和创新性的同时，又兼顾本世纪各学科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各种学术流派观点的多样性、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互补性；要求入选的论文或能对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其观点曾对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或在资料的挖掘、整理、考证和运用上极具功力，有重要的建树；或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对象上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总之，它们应能代表 20 世纪不同时期各学科主要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集中反映一百年来中华学术的发展脉络，并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典范供后来者学习、参考和继承。

由于考虑到广大读者的承受能力，本文库的容量不可能太大。从而使许多学术大家的精品，尤其是长文被忍痛割爱，这使我们深感不安，并怀遗珠

之憾；于是，在无法求全的情况下只能转而力求其精，尽可能确保每一篇入选作品的质量，以乞谅于各位前贤和广大读者。

本文库编选、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及其亲属们的首肯和支持，得到各位学术顾问的悉心指导，也受到学术界众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这些都使我们深受鼓舞。本文库能得以问世，离不开他们的关怀，更离不开诸位主编的辛勤劳作。我们谨在此向一切关心、支持、帮助和参与这项工作的师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库入选的作品均标明原出处，并附每位作者的简介。除对个别长文做了节选、对个别论文略有删节并做说明外，对绝大部分文章都全文照录，仅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和规定，对原文中的繁体字、数字和标点符号的用法等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并校改了原文中个别因手民之误造成的错漏。尽管我们已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本文库还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恳请学术界各位师友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使它能在再版时做进一步的修订。

惟愿《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能够成为联结昨天、今天和明天几代学人的一座学术桥梁，成为沟通海内外中华学人的一条学术纽带；相信20世纪中华学术的优秀成果一定会在21世纪发扬光大，使中华学术跃上新的巅峰！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

目 录

出版例言	(1)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 鼐 (1)
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 (16)
四岳与五岳	顾颉刚 (52)
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	李 济 (61)
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	胡厚宣 (89)
由卜兆记数推究殷人对于数的观念	
——龟卜象数论	饶宗颐 (97)
日月食卜辞的证认与殷商年代	张培瑜 (132)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 (162)
释中国	于省吾 (174)
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张政烺 (181)
西周地理考	齐思和 (198)
豳风说	
——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诗之底本	徐中舒 (228)
古学出于史官论	刘师培 (249)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胡 适 (262)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郭沫若 (268)
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	杨向奎 (314)
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	王玉哲 (345)
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李学勤 (364)

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	蒙文通 (373)
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翦伯赞 (385)
刘向歆父子年谱 (节选)	钱 穆 (403)
汉代察举制度考	劳 幹 (435)
东汉兵制的演变	孙毓棠 (481)
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	陈梦家 (503)
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	马 雍 (535)
秦汉知识分子	许倬云 (551)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 鼐

文明起源的早晚

“文明”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有文章而光明也。”现今汉语中用它来翻译西文中 Civilization 一字，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与“野蛮”相对。^① 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② (Morgan Engels Theory) 将“野蛮”分为“蒙昧”与“野蛮”两个时期，和“文明”时期合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时期。人类从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经过发明文字和利用文字记载语言创作而进入文明时期。

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

① [作者补注] 今本《尚书·舜典》中，有“稽古文明”句，论者或以为较《易经·文言》传为早。但今本的《舜典》篇，为东晋孔传本从《尧典》中分出者。据近人考订，其成书当在战国时代。《舜典》中，开始的二十八字（其中包括“稽古文明”四字），实为南朝齐建武四年（497年）姚方兴奏献本所附加的（参《十三经注疏》本《舜典》篇孔颖达疏及陈梦家《尚书通论》第71~72、112页）。因此，《舜典》篇的“文明”两字，较之《易·文言》传的时代为晚。关于《文言》传的年代，一般以为应是西汉初期的著作。马王堆三号墓（西汉初年）出土的《易经》未见《文言》传。汉字“文”与“明”两字连缀一起构成一个词组，恐不能上溯到先秦时代。

② 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说。美国人类学者路易斯·H·摩尔根 (Lewis H. Morgan) 于1877年发表了所著《古代社会》一书。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按照其生活资料来源的扩充，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在日本，也有译作野蛮、未开、文明的）。而对于前两个阶段，又分别细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三期。即：

- 蒙昧下层期——人类幼年期、植物采集
- 蒙昧中层期——使用火、鱼食
- 蒙昧上层期——发明弓、肉食
- 野蛮下层期——制作陶器
- 野蛮中层期——饲养家畜
- 野蛮上层期——铁矿的精炼
- 文明期——发明文字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恩格斯，于1884年著《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他以摩尔根的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为基础，更加以婚姻形态，提出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说。即蒙昧期为集团婚，野蛮期为对偶婚，野蛮上层期为一夫多妻婚和文明期的一夫一妻婚。此书，为马克思主义最关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经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只有爱琴—米诺文化，因为它已有了文字，可以称为“文明”。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为“文明”。

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①（G. Daniel）在1968年曾认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是六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马雅文化）和秘鲁。前两者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这有考古学的资料为证。印度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H. Frankfort）^②在五十年代初便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可能只有三个：近东（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中、南美（墨西哥、秘鲁）。后者远在新大陆，与旧大陆遥隔重洋，一般认为它们的起源与旧大陆无关。只有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成为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

① 格林·丹尼尔教授（Glyn Daniel）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考古学人类学研究室的主任研究员，并兼任尤尼巴西特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考古学讲师。专门研究西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巨石纪念物和先史美术，对于考古学史也是造诣甚深的。他还是《古代》（Antiquity）这一专业性杂志的编辑人，并且是电视广播的主持人。在他所著的《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学研究》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坂本完春译为日文，改题为《文明之起源与考古学》（现代教养文库）一书中，指出了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河、中国、墨西哥、马雅为六大文明起源之说。以前，一般的说法是，世界的古代文明是在大河流域独自发生的。但根据考古学的资料，作者主张，这些文明之间是依靠互相接触、刺激的连合作用，而产生了文明（坂本完春〔译者书后〕）。

〔译者补注〕丹尼尔于1974年任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1981年退休。

② 亨利·法兰克福（Henri Frankfort, 1897~1954）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人。于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伦敦大学毕业后，担任了英国的埃及考古调查会的发掘主任，主持了泰尔·埃尔·阿马尔那（Tell el Amarna）和阿拜多斯（Abydos）的调查工作。以后，担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伊拉克调查发掘主任，调查了泰尔·阿斯马尔（Tell Asmar）、卡法查（Khafaja）、科尔萨巴德（Khorsabad）等处的遗址。1949年，担任了伦敦大学的沃伯格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主任。代表作有：《近东文明的诞生》（《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1951年），该书中提出的主要论点为：“从原始转移向文明阶段，是不止一次地、逐渐形成的。但其变化，通常是由于和比较进步的外国人相接触而产生的。独自产生文明的例子有三个，即古代近东、中国和中美南美。但是，马雅和印加文化的创立过程不甚清楚；而中国文明，也有可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刺激。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的文明，则可确认为是独立发生的。”

论派的争论的交锋点。^①它不仅是 中国史学和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以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

六十年以前，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文史研究的权威胡适博士，在 1923 年 6 月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还说：“发见澠池〔仰韶村〕石器时代的安特森，^②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

① 关于中国文明之起源的几种说法：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这种说法，很久以来就有了。十八世纪后半，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Joseph de Guignes，或译德经）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埃（M. G. P. 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的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

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以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主中国文明是独自发展之说的，其论据是文明的发生都是在世界上的大河流域。也有人从人骨化石的研究上，提出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了的蒙古人种，是同汉民族的祖先有联系的。另外，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是发生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土著文化。这种文化取代了西方起源的仰韶文化，夏和殷的文化即是承袭了这种文化而衍变出来的。其后，西方系统的周文化占了统治地位。东西两个系统的文化，如此交替地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因而有主夷夏东西之说的。总而言之，中国农耕文化在黄河流域是粟和稗，而在长江流域是水稻耕作。这和西亚的麦作农耕是有本质上差别的。其次，尽管最早的青铜文化是由西方输入的，但它是经土著民族独自发展起来的。

〔作者补注〕木通口隆康在上面注中所说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是由西方输入的”这一说法，现下许多学者对此还是有不同看法的。这问题还有待更多的有关的考古新发现，才能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

② 安特森（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 年）瑞典地质学家，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作过贡献。他为了从事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调查和开发，于 1914 年应聘来华。他在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发现了周口店北京原人的存在。从 1921 年以来，他由于发掘了河南省仰韶遗址，调查了甘肃青海地方（1923~1924），因而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这个基础上，他将甘肃的彩陶文化分为了六期，构成了当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分期的标准。他回到瑞典以后，在斯德哥尔摩筹建了远东古物博物馆，自任馆长，以整理所搜标本，终了一生。主要著作有：《中国原始文化》（英文）（An Early Chinese Culture），1923.《甘肃考古调查报告》（英文）（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1925.《黄土的儿女》（英文）（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1934.《中国史前史研究》（英文），BMFEA（《远东博物馆馆刊》第 15 册，1943.）

假定颇近是。”^① 1925年法国考古学家第·摩根（J. de Morgan）^② 以为中国文明的开始大约在公元前八至前七世纪，更早的便属于中国史前时代，情况完全不清楚。

自从1928年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开始以后，经过了最初几年的田野工作，便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到了三十年代，已可确定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但是当时一般学者仍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有人以为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我们知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所以有些人以为中国文明是西来的，是把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整个拿过来。这是中国文明西来说者用最简单的办法以解决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个复杂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对于小屯殷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先来谈一谈小屯殷墟文化的面貌。

小屯的殷墟文化

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那一季我们发掘西北岗墓群。发掘团在侯家庄租到几间民房住下来。因为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群，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凛凛的武装士兵站岗。我最近一次去安阳，是1976年妇好墓发现后去参观这墓的出土物的。经过这四十年时光，这里的农民生活变化很大，社会治安良好。我们考古研究所在小屯村西建立了工作站，盖了楼房，有办公室、工作室、陈列室和仓库。工作

^① [作者注]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的这几句话见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版，200页。

^② 摩根（Jacques de Morgan，1857~1924年）法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学生时代即对考古有浓厚兴趣。1891年任埃及古物局长官，对于孟斐斯（Memphis）遗迹、达舒尔（Dahshur）珍宝、那迦达（Naqada）王墓等许多遗迹、遗物进行了调查并实施保存。1897年以后，对波斯的苏萨（Susa）进行了有组织的调查发掘。在这里发现了诸如汉穆拉比法典的石碑、那拉姆·辛（Naram-Sin）战胜纪念碑等在对于伊兰（Elam）的研究上极为贵重的资料，把它们都拿到卢佛博物馆去了。所著关于史前文化、古代文明方面的概论性质的书，都是非常出色的。主要著作：《埃及起源的研究》（法文），（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e L'Egypte），1896。《史前人类学》（法文），（L'humanité Pré-historique），1924。《东方史前史》（法文），（Lapréhistoire Orientale），1925。

人员的条件改善了。日本朋友们去安阳参观的，我们都很欢迎。

这四十多年来变化更大的是商代考古的研究方面。我们不仅累积了更多的考古资料，并且研究工作也更加深入了。去年（1982年）九月我在美国檀香山参加商文化的国际讨论会时，与中国台湾省来的代表和国外的同行们（包括日本的朋友）谈到这事时，大家也都有这种感觉。我们现在不是把甲骨片、铜器和玉器当作古董铺或收藏家的古董来看待，也不是把陶器、陶片、铜器、玉石器和骨器作为孤立的考古标本来做研究，而是把商文明作为一个文明的整体来作研究。

作为都市的殷墟

小屯殷墟是在今日河南安阳市西北约三公里余，在洹水南岸。它是商朝后期的首都。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秦汉之际（公元前三世纪末），大家还知道这里是“洹水南殷墟”（《史记·项羽本纪》）。关于都城年代，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盘庚迁殷一直到纣王被周所灭，共二百七十三年，都在这里建都。它的绝对年代，一般采用公元前约1300～前1027年的说法，但是也有提早数十年到一百来年的可能。^①

根据考古发掘结果，我们知道远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小屯殷墟已是一个都市规模的城市。这里的中心区有几片夯土地基。其中较大的一座是三十年代发掘的A区四号房子，宽八米，长近二十米。根据遗迹，这房子大致可以复原。小屯及其附近，还有铸铜、制陶、制玉石器、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当时手工业不仅已经和农业分工，并且已经相当发达，集中于城市内。中心区也有祭殉坑，当为房屋奠基及祭祀鬼神时的牺牲品。占卜是一种宗教活动，甲骨片刻辞后贮藏在坑穴中，有点像后世的档案处。在小屯没有发现城墙。工作站曾经有意地作了调查和试掘，仍是没有找到。只是在小屯村西约二百米的地方，发现南北向的一条殷代灰沟，已探出的部分已达七百五十米。沟宽七～二十一、深五～十米。发掘者推测它可能是王室周围的防御设施。这还有待于继续探测。如果这个推测将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这条灰沟向南延伸后转而东行直达洹水，那末，小屯就不需要筑城垣了。它的北边和东边已

^①〔作者注〕关于安阳殷墟的年代问题，参阅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11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有天然的洹水河道作为防御之用。

最引人注意的是离小屯约二公里半的西北岗帝王陵墓的墓地。西北岗在洹水北岸的武官村的西北。当时我们的发掘团住在侯家庄，所以叫它为“侯家庄西北岗”，实际上它是在侯家庄的东北。这墓地有亚字形大墓八座，其中最大的一二一七号墓，墓室面积三百三十平方米，加上四个墓道，总面积达一千八百平方米；深度在十五米以上。各墓的墓中和附近埋有殉葬的人，少则数十，多的可达一二百人。殷墟西区近年来发现了一千多座小墓，一般长度只二~四、宽零点八~一点二、深二~三米。它们的规模比起大墓来，相差很大。随葬物丰俭则相差更大。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阶级和等级的分化程度，和当时的埋葬的习俗。

商殷时代的文字制度

一个文明的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有了文字制度。商文明的遗物中，在陶器、玉石、甲骨的上面，都曾发现过文字。尤其是刻字甲骨出土最多，已发现的可达十六万片以上。1971 年我们在小屯西地发现一堆完整的卜骨，其中有字的十六片，无字的五片；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又发现有字的大小碎片达四千八百余片。商代的文字制度，是用汉代所谓“六书”的方法，以记录语言。许慎《说文解字·叙》^①中说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借假。这实际上是指象形、象意（包括象事）和象声，而以象形为基本。象形的字，如画一圆圈以代表太阳，画一个半圆以代表月亮，比较容易明白。象意的字，或用两个或更多的象形字合为一字使人领会意思，像许慎所说的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会意），或用几个不成字的点划以表示意思，如许慎所举的上、下两字（指事）。象声的字是用同音的象形字以代表无法象形或象意的抽象概念或“虚字”（假借），或于同音的象形字之外，又加一表示含义的象形字（后世称为“部首”），合成一字（形声）。这样使用不同的部首，便可使

^① 许慎东汉人，《后汉书·儒林传》有传。太尉南阁祭酒。曾任汝县之长。以所著《说文解字》十四卷而著称。此书为研究汉字的基本资料。以小篆即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字为基础，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按部首分为五百四十类，并说明其形和义。每字之下，有时也兼录籀文和古文。

《说文》序中所说的六书乃汉字构造法的六个原则。其大意，在本书中著者已作了说明。其中较为难于解释的为“转注”一类。许书序中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解释多家，诸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

同音而异义的字区别开来，不致混淆。至于“转注”到底指什么，二千年来各种说法纷纭，我们暂时可以不必去管它。我是学过埃及象形文字（hierograph）的。古代埃及人的文字制度也不外于象形、象意、象声而已。它也是以象形为基本，以形声字为最多。古埃及语是多音节语言，所以每字长短不一，不像单音节的汉语，所用以记音的文字是方块字。这和拼音文字完全依靠象声这一方法，很是不同。汉字到今天虽然字体有了变化，字形已改变得不再像原来的物形了，但是它基本上还是沿用商代文字制度。所以甲骨文字只要能改用楷书字体来写，其中大多数仍是可以认识的。不过，甲骨文仍保留一些原始性：例如同一个象形字，写法可以稍有不同。同一形声的字，可以用意义相近的不同的偏旁。假借的字较多，只有一部分加上偏旁成为形声字。这些不统一的现象是象形文字演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商代文字已经成熟到足以记录语言，不能再当做只是一些符号而已。甲骨文已能记录史事，包括帝王及臣僚的名字、战争、祭祀和狩猎等的事迹，史事发生的月日和地点。这表示小屯殷墟文化已进入历史时期，不仅只是有了文字而已。为了创造文字制度，象声方法的采用是一个突破点，否则所写的仍是符号和图画，不是文字。试想如果我们只用象形和象意（包括象事）的方法，那末，不仅是“之、乎、者、也”等虚字，无法表示，便是那些在理论上有可能用象形或象意的方法表达的，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例如甲骨文以一划表示一，一直到用四划表示四；但是十千为万的“万”字，我想谁也不肯写上一万道的笔画来表示它的。这便需要用同音的字来表达了。

已经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有人以为青铜器是文明的各种重要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正确。古今中外许多已掌握冶炼青铜甚至于炼铁技术的民族，仍是“野蛮”民族，不算是“文明”民族。但是我们可以说，最能代表商文明的高度水平是它的发达了的冶铸青铜的技术。商代青铜器包括礼器（举行仪礼时用的酒器、食器等容器）、乐器（铎、铃）、武器和工具、车马器。其中形状奇伟、花纹瑰丽的礼器，一般认为是上古文明世界中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从前有人以为这一类的青铜器只能使用失蜡法才可铸成。失蜡法是用一种易于塑刻又易于熔化的蜂蜡一类的材料做成模子，刻上花纹，然后涂抹上几层细泥和粗泥，留出灌铜口和出气口，最后用火烧烤厚壁的泥范，使蜡熔

化流出。使用时把青铜溶液灌进范内的空隙，凝固后打碎泥范，取出成品，再加修整。近三十年来我们在安阳小屯及其附近不断地发现陶范碎片。最近几年我们又做了模拟试验，知道商代铸造青铜容器是用复合范，不用失蜡法。这和西方各文明（包括印度河文明）很早便采用失蜡法，似乎代表不同的传统。中国最早使用失蜡法的实物是属于春秋时代，例如，近年发现的河南浙川下寺楚墓的铜禁（放置酒器的小方桌）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尊和盘。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四百多件铜容器，其中许多是器形整齐、花纹清晰的佳品，有的器形奇伟，如鸮尊，有的还是前所未见的，如三联甗和偶方彝。至于那两件通高达八十厘米、重达百余公斤的方鼎则以凝重庄严见胜。在湖北崇阳，还发现一件商代铜鼓。冶铸青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采用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首先青铜的原料铜和锡不像石器时代那些制造石器的石料，并不是到处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铜和锡都是矿物，其中自然铜的产地很稀少，一般铜矿和锡矿都要经过提炼才能提出金属的铜和锡。这不像石料那样可以利用天然物如砾石、页岩、板岩等，不必经过化学方法来提炼。金属提炼出来后，还需要翻铸，才能铸造出可用的青铜器来。这些是意味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术的熟练工匠，又要有一定的贸易活动和保证交通路线的畅通，才能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这又需要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上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包括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金属冶炼方面，又有一个商代用铁的问题。最近十多年来，在河北省藁城和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都曾发现过铁刃铜柄钺一件，年代可能比安阳殷墟文化第一期早，或可早到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但是经过分析，这两件都是由陨铁锻造而成，所以并不能作为殷代已能冶炼铁的证据。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用冶炼的铁制成的器物，是在春秋晚期（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

殷墟文化独有的特点

除了上述三个文明的普遍性特点以外，殷墟文化还有它的一些自己独有的特点。但是这些不能作为一般文明的必须具备的标志。殷代玉石的雕刻，尤其是玉器，便是这种特点之一。别的古代文明中，除了中美洲文明之外，都没有玉器，但是它们仍够得上称为文明。妇好墓中出土玉石器七百五十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是玉器。这是迄今发掘出来的数量最大的一批玉器，而且品种众多，雕刻也很精美，有许多实在超过了从前的传世品和发掘品。它们在制

作技术上，已有熟练的操作水平，而造型和花纹方面，许多都是头等的美术品。这些花纹和殷墟铜器的花纹，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殷墟艺术的重要的表现。殷墟又出土了许多骨雕和象牙雕刻，它们的花纹也是和殷墟铜器上的相类似。妇好墓出土的一对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便是这一类中的特出的精品，是前所未见的。

使用马驾的车子，是殷墟文明的另一个特点。但是这也不能算是一切文明都必备的标志，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中，在欧洲人于十五世纪末侵入新大陆以前，始终没有马匹，也没有车子，当然没有驾马的车子。埃及的马车是希克索人于公元前十七世纪左右由亚洲入侵时引进的。这时离开尼罗河文明的开始已是一千多年了。三十年代在安阳曾发现过几座殷墟文化时期的车马坑。1947年安阳发掘的老将石璋如先生说：“[车子的]木质均已腐朽，仅余不相连的铜饰。各种装饰的部位，也非绝对正确。所以精确的结构如何仍难复原。”^① 1935年我在安阳工作时也曾亲手发掘过一座车马坑，颇有同感。但是1950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到战国时代的一座大型车马坑。我亲自动手和熟练发掘工人一起探索，终于搞清楚了车子的木质结构，复原了车子的原状。后来在安阳又发掘过八九座车马坑。发掘是采用辉县车马坑的发掘方法，大多数都可以大致复原。^②

殷墟文明的另一特点是制陶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灰陶占绝对优势（占所采集的陶片的百分之九十）。它替代红、褐、黑陶而成为主要陶系。这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刻纹白陶的出现和原始瓷（Proto-porcelain 即加釉硬陶）的烧造。最后一项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然后传到安阳来而成为小屯陶器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浅灰色的细泥灰陶，颜色均匀，表示陶工控制陶窑中还原气氛的技术更加完善。原始瓷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总之，现下我们可以确定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驾马的车子、刻纹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中国文明各时代都有变化，

① [作者注] 见《中国考古学报》1947年，第2册，第17页。

② [作者补注] 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第546~555页。

每时代各具有一定的特点，但仍维持中国文明的共同的特点。

解放以前，有人认为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有人推测在这以前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更古的、更原始的阶段；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这只好作为一种推测而已。解放后三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可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第一步是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

郑州二里岗文化

郑州二里岗遗址是1951年发现的。当时我们考古所的河南省调查发掘团到了郑州。当地一位对历史和考古有兴趣的小学教师韩维周，在二里岗一带采集了一些陶片、石器和卜骨。他把它当做新石器时代遗址。他把采集到的标本给我们看，并且引我们去观察一些已露出的文化层。我们认为这不是新石器时代的。它的遗物近于安阳殷墟的，很可注意。1952年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便拿这个遗址作为实习地点，证实了二里岗文化的重要性。它是早于安阳小屯的商殷文化。后来河南省的考古队同志为了配合基建，在这里做了多年的考古工作，现已基本上搞清楚二里岗文化的大致面貌。

二里岗文化的时代，根据层位关系，可以确定为早于小屯殷墟文化。至于绝对年代，根据几个碳十四测定年代，是约公元前1600～前1500年（年轮校正过），误差约为百五十年。这便是说，它的年代有百分之六十八的可能是在公元前1750～前1350年的范围以内。相对年代要较小屯殷墟文化为早。它的分布地区，以郑州二里岗为中心，根据已知道的材料，北达河北藁城，南抵湖北黄陂，西到陕西华县，东至山东益都，近年来都发现过二里岗文化的遗迹。

我们就上述的文明的三个主要标志而言，二里岗文化都已具备了。它在郑州的商城，有夯土城垣。城的周长近七公里，城内总面积约二十五平方里。城内东北部发现有大片夯土台基，当为宫殿遗迹。城外近郊有几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包括铸铜、制骨、烧陶等手工业。黄陂盘龙城也有夯土城墙，周长虽只一点一公里，但城内也有保存较好的宫殿遗迹。其次，二里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这里曾发现过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只有一字。其余一件有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的，是在翻动的地面上找到的。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有划刻记号的，但是那不是文字，只是符号。古今有文字制度